

王国维教育思想浅析

鲁西奇 罗毅刚

作者 鲁西奇, 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武汉, 430072

罗毅刚, 武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 武汉, 430072

关键词 王国维 教育思想 哲学 美学

提要 王国维的教育思想可概括为三点: (1) 哲学教育为教育之本; (2) 美育使人入于高尚纯洁之域; (3) 教育之宗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他认为教育不应当仅以经世致用为目的, 强调哲学教育在教育中的基础作用, 提倡美育。他从思想自由的角度出发, 反对在教育上独尊儒术, 倡导引进西方哲学。凡此, 都表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先进性, 即使在 9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 仍有不少可资借鉴之处。

王国维初治哲学, 他对于西方哲学尤其是康德叔本华哲学有较为精深的研读, 其教育观亦多以哲学思想为根基, 所以在他的教育思想中, 哲学教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将哲学视为所有学问中最高学问, 认为“知识之最高满足, 必求诸哲学。叔本华所以称人为形而上学的动物而有形而上学的需要者, 为此故也”^①。而“不通哲学, 则不能通教育学及与教育学相关之学”, “且夫探宇宙人生之真理而定教育之理想者, 固哲学之事业”^②。因此, 哲学教育实为教育之根本。

上世纪之交, 时代的主旋律是救亡图存, 先进的知识界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革新和图强上。一切教育的指标, 都为民族富强和经世致用的前提所决定。在这一时代背景下, 科学因为有实际的效用, 而备受重视; 各种政治学说也因为有助于社会政治问题之解决, 与科学居于同样重要的地位。而抽象的哲学则被认为是无用之学, 既无益于国计民生, 亦无益于修身齐家。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 甚至认为哲学有害, 理由是当时日益蔓延的自由革命之说, 多源于西洋哲学, 则哲学能够诱发政治上的革命运动

因此, 在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初), 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具名奏定的《学堂章程》中, 对于哲学教育就十分忽视, 对西洋哲学更是持一种近于轻视的态度。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中, 王国维批评《章程》所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制度的根本错误“在缺哲学一科而已。夫欧洲各国大学无不以神、哲、医、法四学为分科之基本, 日本大学虽易哲学科以文科之名, 然其文科之九科中则哲学科巍然居首, 而余八科无不以哲学概论、哲学史为其基本学科者”。而在章程所设之经学科中, 则只有传统的经学科, 而无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哲学。不独不列西洋哲学, 即便是中国“周秦诸子之学, 皆在所摈弃, 而宋儒之理学, 独限于其道德哲学之范围内研究之。”

对于哲学有害论, 王国维指出, 他所说的哲学, 是形而上学; 自由革命等学说, 属于“政治法律之方面, 而不属于哲学之方面。”“疑此学 [按: 指哲学] 为乱之 藪者, 可谓全无根据之说也。”对于哲学无用说, 王国维则力言其无用之价值:

以功用论哲学, 则哲学之价值失。哲学之所以有价值者, 正以其超乎利用之范围故也。且夫人岂徒为利用而生活者哉?

人于生活之欲外,有知识焉,有感情焉。感情之最高之满足,必求之文学美术;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故无论古今东西,其国民之文化苟达一定程度者,无不有一种之哲学;而所谓哲学家者,亦无不受国民之尊敬。

然而,面对一心以实用为务的国人,王国维又不得不指出哲学的“无用之用”,所以他又补充说:“自间接言之,则世所号为最有用之学如教育学等,非有哲学之预备,殆不能解其真意。”这种无用之用,实是哲学最有价值之处,因为它是一切人文思想的基础。哲学之与其它人文科学的关系,正如数学、物理学之与工科的关系一样。所以,即令哲学“一无所用,亦断无废之之理,况乎其有无用之用哉!”因此,哲学乃是天下最尊贵、最神圣的学科,“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③

经世致用与道德培养是贯穿于《学堂章程》中的根本性原则。《章程》奏请设立经学科大学,就是要将孔、孟之道,提升到独尊的地位,并以之为立国的最高道德准则。《章程》的《学务纲要》“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一项说:

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学失其本则无学,政失其本则无政。其本既失,则爱国爱类之心亦随之改易矣。安有富国之望乎!

《章程》所拟各节,便是要“学堂中决无一荒经之人,不惟圣经不至废坠,且经学从此便可昌明矣。”^④孔孟之道既是“圣经”,则不同的见解当然是不能容纳的。对此,王国维一方面反复申论以经世致用及道德培育为目的之经学与理学非真正之哲学,一方面则高标“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从”的学术自由主义之态度。王国维写道:

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苟儒家之说而有价值也,则因研究诸子之学而益明;其无价值也,虽罢斥百家,适足滋世人之疑惑耳。吾窃叹尚书[按:指张之洞]之知之与杞人等也。……若夫西洋哲学之于中国哲学,其关系亦与诸子哲学之于儒教哲学等。今即不论西洋哲学自己之价值,而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异

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⑤

在这里,王国维提出了两点极为重要的根本性问题。第一,一个社会的教育,是否只在训练“有用”的专材,而对于“无用”的科目则置之不理?如果以世俗有用无用为标准,则在思想实际的民族中,在现实窘迫、生活穷困的社会里,哲学(指纯粹的形而上学)、文学(指纯文学)、音乐、艺术,便无容身之地了。而人的身份、价值与尊严,也都在有用无用的尺度下由社会所取决。如此的社会,是否有健康、平衡的发展?而个人在此种价值观念下,情绪是否能得到适度的舒展,兴趣能否得到健康的发展,而心灵、智慧和眼界,是否能超越最切近现实功利的层面?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已远远超出了教育学本身的范畴,而牵涉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性认识。第二,是孔、孟的儒家思想在20世纪的现代中国所应占有的地位问题。换言之,20世纪的中国,是否仍以一成不变的孔孟之道作为立国的最高准则,定于一尊,而对于不同的观点,则以异端视之?王国维是20世纪初呼吁独立思想和学术自由最力的一分子。在力主学术自由时,他所强调的只是一个态度的问题而不涉及任何一派学说的内容。他所要求的,只是一种兼容并蓄的风气,使得各种学说,相互对比,而各人有一自由取舍的余地。

基于以上认识,王国维主张:(一)合经学科大学于文学科大学中,而定文学科大学之各科为五:经学科、理学科、史学科、中国文学科、外国文学科,其中,经学科与理学科分别以教授纯粹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为主,相当于现在的哲学系和社会、政治系。在其它各科所当授科目中,哲学亦应占有重要地位。如中国文学科所应授的科目,包括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心理学、名学(相当于现在的逻辑学)、美学等,与哲学有关的科目占该学科应授科目(共11种)的一半强^⑥。(二)取消《章程》所定经学科大学中以中国传统儒学为主的科目,易之以现代哲学科目。在奏定《大学堂章程》中,经学科大学有11门,即周易学门、尚书学门、毛诗学门、春秋左传学门、春秋三传学门、周礼学门、仪礼学门、礼记学门、论语学门、孟子学门、理学门,所授之科目皆为经学与理学^⑦。王国维既主张将经学科合于文学科中,则此科乃文学科大学科目之一,不必另行分科,凡周易、尚书诸科,皆得纳入中国哲学史范畴。而王国维所设计的文学科大学经学科

所授科目，则包括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心理学、伦理学、名学、美学、社会学、教育学、外国文学等10种，与中国传统的诸经之学已完全不同。（三）不仅大学各科应普遍设置哲学科，优级师范学校亦应设哲学科。因为“不通哲学，则不能通教育学及与教育学相关系之学故也。”^⑧

二

王国维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叔本华哲学。他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一文中说：

自十九世纪以降，教育学蔚然而成一科之学，溯其原始，则由德意志哲学之发达是已。当十八世纪之末叶，汗德始由其严肃论之伦理学而说教育学，然尚未有完全之系统。厥后海尔巴德始由自己之哲学而组织完全之教育学，同时德国有名之哲学家往往就教育学有所研究，而各由其哲学系统创立自己之教育学，裴奈楷然也，海额尔派之左右翼亦然也。……独无敢由叔本华之哲学组织教育学者^⑨。

王国维认为“由叔氏之哲学说以推绎其教育上之意见，其条目之详细或不如海、裴诸氏，至其立脚地之坚固确实，用语之精审明晰，自有哲学以来，未有及叔氏者也。”所以，王国维此文即由叔本华哲学出发，演绎出他自己的教育思想。

叔本华哲学以反理性主义著称，强调直观在认识中的作用，此种观念反映在教育上就表现为重视经验而不重视书籍“叔氏于教育之全体无所往而不重直观，故其教育上之意见重经验而不重书籍。”“观察实物与诵读，其间之差别不可以道里计。一切真理唯存于具体的物中，与黄金之唯存于矿石中无异，其难只在搜寻之。书籍则不然。吾人即于此得真理亦不过一小影耳，况又不能得哉？……书籍上之知识，抽象的知识也，死也；经验的知识，具体的知识也。”^⑩而美术之知识全为直观的知识，因而美术知识在知识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此也就决定了美育之在教育中的重要性。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⑪一文中指出：教育的宗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要达到这一目的，需在体育和心育上均衡发展。体育之重要，不言而喻；心育方面，有智育、德育和美育。“完全之教育，不可不备此三才。”智育与德育之必要，人人知之，至于美育之重要，王国维说：

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要之，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

在这里，王国维强调美之为物，使人入于高尚纯洁之域。这个高尚纯洁之域，也便是人的感情达到完美的境界。关于此点，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一文中曾有全面的阐述：

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苦痛相关系。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此犹积阴雨弥月而旭日杲杲也，……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⑫

王国维所说的“美术”，即相当于现在的艺术。美术的价值即若此，则美育之重要自不待言。而中国向来轻视美术，亦忽视美育。“我中国非美术之国也。……美之为物，为世人不顾久矣。故我国建筑、雕刻之术，无可言者。至图画一技，宋、元以后，生面特开，其淡远幽雅，实有非西人所能梦见者。诗词亦代有作者。而世之贱儒，辄援‘玩物丧志’之说相诋，故一切美术，皆不能达完全之域。……所以我国人审美之趣味之缺乏如此，则其朝夕营营，遂一己之利害而不知返者，安足怪哉！”^⑬所以，在中国更需要加强美育。

在一般人观念中，美育仅为德育与智育的辅助手段，而王国维则将三者置于平等地位，并特别强调美育本身的内在价值。他在音乐教育上的见解，可以看出他对美育本身的内在价值之重视。王国维对当时音乐研究之勃兴和小学设唱歌一科，认为是可喜的现象^⑭。章程规定小学校设置唱歌科之目的，在于以之作为修身科的辅助。对此，王国维是不反对的，不过在具体做法上，则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音乐最重要的方面，在其形式而不在其内容（歌词），所以，“虽有声无词之音乐，自有陶冶品性、使之高尚和平之力，固不必用修身科之材料为唱歌科之材料也。”唱歌科不应“徒以干燥拙劣之辞，述道德上之教训。”应考虑“古诗中之咏自然之美及古迹

者。”这种具体性质的材料,“可以呈于儿童之直观,故较之道德上抽象之教训,反为易解。”能循此一原则,“则唱歌科庶不致为修身科之奴隶,而得保其独立之位置欤。”

此处所说音乐不应当为修身科之奴隶一点,尤为重要。王国维早先虽然主张美育应为德育之助,可他从不认为音乐艺术只是道德的奴婢,扮演一种拙劣的次等角色。相反,他认为艺术在道德上唯一的功效,是在无形之中潜移默化,把人的精神提升到更高的纯洁完善之境。不但如此,王国维在最后检讨艺术和道德的价值时,终于承认两者并无高下从属之分,而是两者同时完成的一种至高境界。人的内心到了最高的理想之境时,其美丽之心与道德之心,同时臻于高尚纯洁而不可分离。下文可视为王氏对于艺术和道德之关系的最后的成熟见解:

泰西自雅里大德勒以后,皆以美育为德育之助。至近世谠夫志培利赫、启新等皆从之,及德意志之大诗人希儿列尔出而大成其说,谓人日与美相接,则其感情日益高而暴慢鄙俗之心日益远。故美术者,科学与道德之生产地也;又谓审美之境界,乃不关利害之境界。故气质之欲灭而道德之欲得由之以生。故审美之境界乃物质之境界与道德之境界之津梁也。于物质之境界中,人受制于天然之势力,于审美之境界则远离之,于道德之境界则统御之。由上所说,则审美之位置,犹居于道德之次。然希氏后日更进而说美之无上之价值,曰:如人必以道德之欲克制气质之欲,则人性之两部,犹未能调和也。于物质之境界及道德之境界中,人性之一部必克制之,以扩充其他部。然人所以为人,在息此内界之争斗而使卑劣之感跻于高尚之感觉。如汗德之严肃论中,气质与义务对立,犹非道德上最高之理想也。最高之理想,存于美丽之心。其为性也,高尚纯洁,不知有内界之争斗而唯乐于守道德之法。此性质,唯可由美育得之。此希氏最后之说也。顾无论美之与善,其位置孰为高下,而美育与德育之不可离,昭昭然矣。^⑥

三

在1911年所撰《国学丛刊序》^⑦中,王国维说: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

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何以言学无有用、无用之区别?王国维从探求知识的角度论述说:

余谓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欧洲近世农工商业之进步,固由于物理化学之兴,然物理化学高深普遍之部,与蒸气电信有何关系乎?动植物之学,所关于树艺畜牧者几何?天文之学,所关于航海授时者几何?心理社会之学,其得应用于政治教育者亦少。以科学而犹若是,而况于史学、文学乎?然自他面言之,一切艺术悉由一切学问出,古人所谓“不学无术”者非虚语也。夫天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能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此非苟且玩之徒所与知也。^⑧

学术有用与无用之辩,由来已久,迄今未息。一般认为,科学技术以及一些社会科学于人类物质财富之创造及社会制度之构建有很大的作用,是为“有用”;而哲学、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则为“无用”。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影响到中国历史及现今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一思想背景下,中国近现代教育自诞生起,就逐渐形成了重实用、轻抽象,重科技、轻人文的传统;这一传统发展到现在,与经济优先发展的状况相适应,遂使教育越来越倾向于重视实用教育,而对人文基础教育则越来越忽视。

自古以来,人类教与学的知识就分为两种:一种可称为“普遍的知识”,它们往往与实际利益和应用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关系到人类对自己、对世界、对自然和宇宙的一般认识与理解,即现在一般称为“基础理论”的东西。它们虽然不能产生实际的利益,没有实用价值,却对于人性的完善和提高,以及人类的文明程度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种

则是“实用的知识”，也可称为广义的技术。这类知识与社会需要密切相关，具有广泛的实用性，给人类带来直接的利益。这两种知识分别满足人性的不同需要，对于人类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人类需要实用的知识对付眼前的问题和需要，也需要普遍的知识给自己确定长远的目标和选择。因此，人类的教育一开始就包括这两个方面；而其目的也包括两个方面：个人自身的完善与社会的健康发展。

事实上，社会的健康发展与个人的自身完善是不可分割的。社会的发展并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发展与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而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综合与和谐发展；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并不代表着精神文明也就能够高度发达，而精神文明落后必然会影响物质文明的建设。此点已为众所周知，需要强调的是，社会是由无数的个体所组成的，个体的人格修养、道德水准与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个人的修养则有赖于其所受的教育。在一定意义上，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性远远地超过社会的高速发展。与此相对应，一种健全的人格教育也显然远比仅仅是知识灌输与技能训练的教育要重要得多。

王国维在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上的地位及其现代意义，要在这一认识背景下才显出它不同寻常的意义来。他的教育思想，不以经世致用为目的，更没有急功近利的心情，所以能以思想的内在价值为其去取的标准。他提倡哲学、文学和艺术的重要，不是因为它们可以作为培养民族主义或灌输道德教训的工具，而是由于它们在个人身心发展上的重要性和它们所能给予人们思想上、精神上的满足。教育的目的，不是在造就国家和社会的齿轮，而是在培育健全的个人。这种见解，和时人的看法，南辕北辙，却正是王国维在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性之所在，也是他的思想在今天仍发人深思的原因。此其一。

其二，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大潮面前，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无不把科学视为挽救危亡的灵丹妙药，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开启民智到科学救国，科学在形形色色的思想体系中一直占有令人瞩目的地位。在此种思想背景下，论教育者几乎完全偏重于科学教育。一部近代教育史，基本上可以看作是西方科学在中国生根、成长、发展、传播的历史。与国人对科学的向往和崇拜不同，王国维独树一帜，认为哲学教育乃教育之本，强调美育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形成了独特的具有浓厚

人文主义色彩的教育思想。虽然他的教育主张并没有受到时人尤其是当政者的重视，因而也就没有付诸实施的机会，但这并不影响他在中国近代教育思想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他从思想自由的角度出发，反对在教育上独尊儒术，倡导引进西方哲学，并以西方哲学的思想方法重新考察中国传统的经学与理学。凡此种种，都表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先进性。它启发我们重视人文基础教育，加强受教育者的素质培养，将美育与道德教育充分地结合起来，唯有如此，才能培育出在知识、技能以及人格方面都“完全之人物”。

注 释：

- ①⑤⑥ 《〈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见《王国维先生全集》（下简称“《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台湾大通书局1976年版，第1929~1942页。
- ② 《教育偶感四则》之三，“大学及优级师范学校之削除哲学科”，见前揭《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第1847页。
- ③ 《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见前揭《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第1836~1837页。
- ④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见朱有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3~84页。
- ⑦ 《奏定大学堂章程》，见前揭《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770~776页。
- ⑧ 《教育偶感四则》之三“大学及优级师范学校之削除哲学科”，见前揭《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第1846~1848页。
- ⑨ 《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第1684~1685页。
- ⑩ 《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第1708~1710页。
- ⑪ 收入《静安文集》，见《全集》第5册，第1855~1858页。
- ⑫ 见《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第1720~1721页。
- ⑬⑭ 《孔子之美育主义》，初刊于《教育世界》第69期（1904年2月）。收入刘刚强辑《王国维美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 ⑮ 《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见《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第1983~1984页。
- ⑯⑰ 《国学丛刊序》，见《王国维遗书》第4册，《观堂别集》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B面~第10页B面，第9页A面。

（责任编辑 张琳）